

盱眙县委办公室来信指出,本报五月二十三日第三版《党的生活》刊登的《为什么不顾抗旱用水洒马路?》一文,与事实不符。经调查了解,盱眙县委办公室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诚恳地接受批评,并在今后工作中引以为戒。

向着明天 奋勇前进

——纪念邹韬奋先生逝世三十五周年

史良

我和韬奋是在三十年代救国运动中认识的，他的年纪比我稍长一些，但在我印象中却比我要小。这是因为，他于事业的精力是那样旺盛，他待人的态度是那样热情。

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不平常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但国民党反动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主要精力用于反共反人民，妄图扼杀国内进步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日益尖锐，一切有爱国良心的中国人，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无不愤慨。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等刊物，强烈呼吁团结御侮，抗日救亡，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并向人民指出了光明的所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憎恨。韬奋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上海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从事爱国救亡运动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先生和我。后来我们被关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韬奋他们六个人被关在一处，我被关在女监。我们虽不关在一处，但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互通消息。韬奋不仅是极有正义感和事业心的友人，同时也是一个极机灵的，在监狱里，我所得到的消息，往往都是韬奋通过同情我们的狱卒传递过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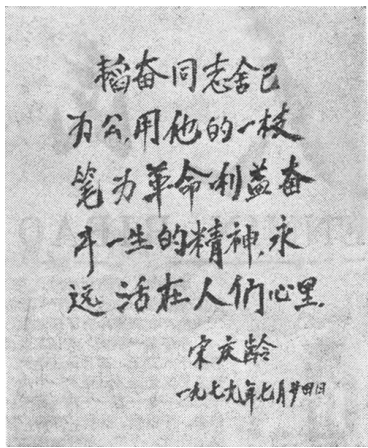
爱国有罪，救亡坐牢，这个不能容忍的政治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当时进步的和中间的舆论界也给予我们以强烈的支持。因此，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恐慌。他们通过一些好心的中间人和我们商洽出狱的“条件”。要我们从监狱转到反省院，然后再从反省院释放。意思十分清楚，这是要我们承认国民党反动，反省有效，才教育释放。我们在“家长”沈钧儒先生领导下，商议决定，宁愿坐牢半年，决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严正拒绝了这个荒唐的“条件”。韬奋对于这个所谓“条件”异常气愤，象在别的事情上一样，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崇高气节。“条件”没有谈成，我们继续坐牢，一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

两党再度合作，我们才在党的营救下，在全国人民强烈呼吁释放一切政治犯的浪潮中，从苏州监狱里被释放出来。

韬奋一生的事业是办刊物、开书店、写文章，宣传进步文化。我不仅是他在爱国救亡运动中的同志，同时也是他主办的几个刊物的热心的读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里，办刊物、书店都不容易自立，而韬奋办的刊物和书店不但能依靠自己的业务维持下去，并且蒸蒸日上。其主要原因是，他所办的《生活》、《大众生活》等刊物和生活书店所出版的书籍，反映了时代的动向，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因而得到读者的欢迎和爱戴。一个文化事业只有办到这样的程度才能算是群众的文化，只有群众的文化才富有生命力。韬奋一生事业的成功，固然和他个人的勤奋有关，也和他始终与群众声气相通有关。我还记得他办的刊物上有《读者信箱》一沙千栏、沙千里、王造时先生和我。后来我们被关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韬奋他们六个人被关在一处，我被关在女监。我们虽不关在一处，但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互通消息。韬奋不仅是极有正义感和事业心的友人，同时也是一个极机灵的，在监狱里，我所得到的消息，往往都是韬奋通过同情我们的狱卒传递过来的。

提起生活书店被封，使我回忆起一件事情。那是一九四〇年的一个夜晚，韬奋匆匆忙忙地来到我的住处枣子湾“犹庄”，告诉我：生活书店各地分馆的一个被封，人员被捕，他正在到处奔走，但那些国民党元老都是互相推诿，这样下去，他的全部事业就有被摧残殆尽的危险。更重要的是，这样下去，进步文化将受到严重摧残；被捕人员也不知下落如何。他问我，有没有别的路可走？我自告奋勇地说，我和他夫妇指导委员会的关系，可以去找一下“指导员”宋永龄试一试看。第二天，我到了宋永龄家里，说明来意以后，宋推说此事她不了解，要问一下“老头子”，并留我吃饭。近中午时，蒋介石回来了，我又向他当面谈了一下生活书店被封和人员被捕的事，并告诉

他，书店被封，人员被捕，社会上都很不安，这对团结抗战是很不利的。蒋介石装做“愕然”的样子，说：竟有这样的事情？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要查问！一定要查问！我当时认为，这位国民党最高负责人一口应允查问，事情大概好了。回来以后就告诉韬奋。但在以后，书店却继续被封，人员继续被捕，到了一九四一年初，除了重庆总店以外，各地分店都被封闭干净了。这是蒋介石流氓手法的一次表演。在这个情况下，韬奋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决定秘密潜离，走向更广阔的斗争。临行前的一天夜晚，韬奋匆匆忙忙到我住处，讲了几分钟的话就离开了，说是还要到张家花园去看望黄任之先生，我只能祝他一路顺风。向着明天，他走了。这是我和韬奋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悲愤和沉痛的气氛中见面的。后来从其他朋友那里陆续得到他的消息，知道他几经转徙，最后到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四四年秋季的一天，吴玉章先生派人到沈钧儒先生和我这里来，告诉我们关于韬奋患脑癌，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的消息；同时转告我们，根据韬奋生前的请求，党中央已批准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沈老和我一面为韬奋逝世而悲痛，一面又为他被批准入党而庆幸。韬奋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的一员。他



宋庆龄副委员长为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三十五周年的题词。

的战斗的一生反映着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而终于找到光明、找到真理的全部历程。正象陈毅同志所说：“他是一个以民主主义者走入战场，伟大的革命实践推动他向前迈步，直至与共产主义相结合”。

今天是韬奋逝世三十五周年，缅怀既往，感奋有加。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转折的历史年代，我们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我们还要在党的领导下，把它建成现代化的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任重而道远，我们充满激情和希望。在这新的斗争开始的日子，我要向韬奋表示，我一定要踏着韬奋的足迹，在永远前进的道路上，向着新的更加灿烂光明的明天奋勇前进。

文化部决定在直属艺术表演单位实行考核制度

制，改进领导方法，坚决改变赏罚不明，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不正常现象。通过考核，普遍奖励有贡献的文艺工作者，发现和选拔人才，促进文艺工作者钻研业务，努力工作。同时认真贯彻执行考核制度，按劳分配的原则，改革管理体制。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文化部最近决定在直属艺术表演单位实行考核制度，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推行。文化部的这个决定，是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文化艺术工作的着重点切实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充分发挥文化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繁荣文艺创作，提高文化艺术艺术品的质量，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对文化艺术的需要而作出的。

文化部直属艺术表演单位专业人员进行考核办法指出，根据党中央关于各行各业人员都要实行考核的精神，应当有准备地在全国文化艺术单位实行定期考核制度，通过考核，普遍奖励对国家文化艺术事业作出贡献的文艺工作者，鼓励有志之士，发现和选拔优秀的文艺人才，促进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向上，钻研业务，努力工作，在实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作出贡献。同时，通过考核制度的建立，认真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改革管理体制，促进文艺单位和领导管理部门按照艺术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改进领导方法，提高管理水平，从思想上和制度上克服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坚决改变那种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赏罚不明，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不正常现象。

考核办法规定，考核内容包括业务考核和工作考核两个方面。业务考核，主要是考核本人目前的实际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工作考核，主要是考核本人在粉碎“四人帮”后这几年工作上完成任务的情况，包括数量和质量，也要联系历史上的贡献和政治思想上的表现。经过考核，对每个文艺专业人员当前的实际业务水平、工作表现及其历史贡献作出鉴定或恰当的评价。然后，分别不同情况，明确其业务职称，确定其工作岗位，在国家今后安排升级时，按国家分配的升级指标，逐步调整其级别待遇。

对于少数在业务上有突出成就或卓越贡献，在文艺界或戏剧、音乐、舞蹈等某

一方面有较大影响的知名艺术家，可以被破格提拔。现在工资级别过低，在待遇上明显不合理的，可以越级提升。

对于这些年来业务上有提高，工作上有成绩，有建树而待遇较低的，应当适当调整其待遇，予以晋升。其中，业务水平较高，工作成绩较大的，可优先提拔。

对于业务上原来有一定基础，由于长期没有获得业务实践的机，或本人不努力，因而业务荒疏，工作上表现一般的，暂时不动，不升也不降。对于这些同志，可在今后一两年内的再次考核中，视其业务水平和工作情况，对其职称或级别待遇再作适当的调整。

对于个别在业务上原来就没有基础，完全不能适应所担任的文艺专业工作的，应另行分配工作。

在实行考核制度的同时，辅以评奖。结合年终总结评选本单位的优秀创作和演出，先进集体和个人给予奖励。突出优秀的创作和成绩优异的集体与个人，由文化部另行奖励。

文化部的决定强调，对艺术表演单位文艺专业人员进行考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因此，一定要做好考核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制订各类艺术表演人员的业务职称，各项业务和工作的考核标准，有关的各项实施细则；特别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使全体文艺专业人员进行考核，实行考核是办好文艺事业的积极方针，是为了鼓励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创作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是消极的权宜之计，而是繁荣文艺事业的一项重大改革。在做上，一定要走群众路线，采取领导、专家、群众相结合的办法，不能少数人说了算，更要注意排除排斥性干扰。在考核前，要给文艺专业人员进行比较充分的准备时间。

文化部决定，一九七九年，先在文化部直属艺术表演单位的文艺专业人员进行考核试点，以取得经验，然后制定全国文化艺术考核评价制度，一九八〇年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以后，每年定期考核一次。

实行考核和奖励的办法，也将促进精神产品生产的发

展。我们党对干部，对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从来是鼓励先进，帮助和激励后进。在坚持精神鼓励的同时，认真实行考核和评奖制度，有利于形成一个个人奋发向上，努力提高业务，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良好气氛，也就有利于我们的事业迅速兴旺发达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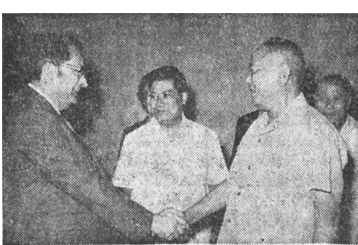
实行考核和评奖制度，是改革干部制度的一项积极措施，是一项政策性强而又十分细致的工作。我们要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克服错误思想，也要排除其他各种错误思想（如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认真把工作做细、做好，使干部制度的改革逐一付诸实施。

李先念副总理会见奥中友协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李先念副总理今天上午会见了以奥地利农林部长盖特尔夫·海顿为团长的奥中友协代表团。

在交谈中，李先念副总理称赞奥中友协为促进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作出的贡献。他指出，目前中奥关系很好，两国经济合作领域很广泛，奥地利在发展工业、农业、林业、牧业方面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海顿部长介绍了奥地利在发展经济，特别在发展林业方面的经验。他说，奥地利明文规定，树要生长到一定年龄才能砍伐，并且砍伐一棵至少要种一棵新树。这样，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面积现在保持在占全国面积的百分之四十四。他说，中国具有发展国民经济许多有利条件。奥地利愿意同中国合作。

奥地利驻中国大使葛德乐参加了会见。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林业部副部长杨珏，中国驻奥地利大使



图为会见时情形。新华社记者摄

捍卫真实性 反对假报道

（上接第一版）它同医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创伤一样，并非一举手之劳，而需要进行坚韧的战斗，做出不懈的努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党工作者重点的转移，经济宣传在报纸上的比重越来越加重，保证经济宣传的真实性，杜绝经济宣传的假报道，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现在，全国正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过去报纸经济宣传节约运动是有成绩的，但也有教训。教训之一，就是夸大典型，虚张声势，大轰大嗡，助长盲目性。我们应很好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按照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来组织经济宣传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宣传，为打好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后第一个战役，鼓实劲，传真经。

为了纠正弄虚作假的歪风，要进一步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大力加强新闻必须真实的宣传和教育。出现假报道，作为新闻工作者本身来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新闻战线，至今仍有一些同志对“什么是新闻”、“应该怎样写新闻”了解不多，对新闻必须真实缺乏深切感受，搞不清写报道与搞创作的区，甚至出现虚构情节，“合理想象”来弥补材料之不足。也有些同志对客观事物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采访中浅尝即止，偏听偏信。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明知故犯。有的为了一鸣惊人，沽名钓誉，信手而来，只求见报，不顾事实。有的“帮八股”流毒尚在，随“风”为文的恶习未改，只要一听上面有了“新精神”，就赶快找印证，套例子，往事实上贴标签；“风向”一变，又赶快“扭角度”、“改路子”。于是，同一件事，今天被说成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成绩，明天又被说成是贯彻执行那个精神的成果。事实就象一块胶泥，由他们随心所欲地捏来捏去。在处理稿件的过程中，编者该调查的不调查，应核实的不核实，凭主观臆断，大笔一挥，随意调整，也是造成新闻失实的一个原因。假报道，都需要我们通过认真整作风加以解决。

反对假报道，不光是新闻工作者的事情，它也与党的各级领导密切相关。文风反映党风，文风不正，正是党风不正的一种表现。有些假报道，不是记者或者通讯员写虚捏了，而是有关党委的某些领导人有

意弄假。他们喜欢恶搞，总愿报喜不报忧，对记者、通讯员写本地区的成绩，不管抬得多高都同意，对报道本地区的缺点、错误，总是找各种理由不让登报。他们把新闻报道作为自我吹嘘、骗取荣誉的手段。有的得知上级要来检查，记者要求采访，就事先打招，精心作安排，看什么现场，介绍什么情况，早就布置好了，使你“不识庐山真面目”。有的见不到报纸上登自己单位有成绩的新闻，就对搞通讯报道的同志施加压力，甚至示意手下的“笔杆子”弄虚作假。当某假报道被读者揭发出来，报社派人进行调查时，有的不是知错改错，而是一再留难，庇护错误，希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一错再错。特别使我们感到棘手的是，有些地方派性严重。他们不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组织宣传报道，而是从“派”的利益出发决定写什么稿，发什么稿。编辑部不可能了解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单位的详细情况，有时就表扬了不该表扬的单位，批评了不该批评的单位；当编辑部派人去调查，要根据事实进行更正时，他们又设法阻挠，不愿把真相告诉读者。有的领导同志，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明明是自己叫记者、通讯员把错事写成了好事，记者揭发以后还坚持错误，不准更正。类似这样的问题，值得引起全党的重视和警惕。

我们承认有事实不符的假报道，并且不留情面地在报纸上公开揭露和批判弄虚作假的坏作风，这是我们应有的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也是我们区别资产阶级新闻的重要标志。各级组织和广大读者对报纸的爱护和监督，是帮助我们新闻队伍扫除这种不正之风的极其重要的条件。《人民日报》热忱地欢迎各级党组织、各兄弟新闻单位和广大读者，一如既往地给予我们支持、帮助和监督，协助我们把反对假报道、维护新闻真实性的工作做得更好。让我们共同努力防止假报道，力求杜绝假报道，象农民除草那样，把假报道从新闻园地中不断铲除，连根拔掉。

——☆☆——☆☆——

更正：本报七月二十三日第三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判》一文三段头“法庭由……组成”应为“开庭时，出庭的有：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鉴定人”。



短评

最近，文化部决定对直属艺术表演单位的文艺专业人员进行考核和评奖制度。这是一个鼓励先进，激励后进，调动文艺专业人员的积极性，也是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的积极措施。对文艺专业人员进行考核，并根据各人的工作好坏、能力大小、水平高低、贡献多少，来决定职称和在今后适当时候决定待遇，是贯彻党的干部政策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需要。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破坏了党的干部制度，也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他们鼓吹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干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积极作用

姚 壮

我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促进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必将起积极的作用。为什么能够制定和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合营企业有些什么特点和优点？在举办合营企业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这些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吸收外国投资在本国建立合营企业，是国际经济合作中通常使用的一种形式。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利用外国资本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本国经济，也是早有先例的。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就曾提出实行“租让制”，主张把当时苏维埃国家还无力开发的油田、矿山、荒地租给资本家，给他们一定的利润，借以发展苏维埃经济。二十年代初，苏维埃国家建立了有外国资本参加的合营企业，一九二二年春季，这样的企业就有十七个。我国在五十年代中苏关系正常的时期，也曾举办过两国合营企业，现在也还同波兰、坦桑尼亚设有合营的远洋运输公司。但是，总的说来，这种合营企业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那末，现在有哪些更为有利的条件适合于我们吸收外国投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呢？就国内情况来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政治上出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经济上正在着手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为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奠定基础。在生产技术上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虽然还有不小的距离，但我国三十年来，还是建设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全有可能和外国企业进行生产上的合作。在国际上，我国的贸易信誉是比較好的，很多国家的人民也都愿意中国迅速强大起来，愿意帮助我国人民进行经济建设。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也有多余的游资可供我们利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有选择地与外资合作某些合营企业，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我们相信，这次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合营企业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合营企业应遵守的基本原则，以及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必将有利于合营企业的发展，加速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济组织。按照我国的具体情况，它是一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籍的投资者所建立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分享收益的联合企业。这种合营企业，与吸收外资的其他方式如补偿贸易、生产技术合作等比较起来，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有更为有利的地方。首先，建立合营企业可以比较有效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装备。一般说来，外国人是不会通过专利许可来转让最先进的技术的，而合营企业则由于外国投资者的直接参加，共负盈亏，经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就有较大的可能得到先进的技术、技术和装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也正是这

样要求的。该法第五条第二款称：“外国合营者作为投资的技术和设备，必须确实是适合我国需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其次，建立合营企业，可能利用外资企业原有的国际市场，为我国扩大商品出口创造有利的条件。参加我国合营企业的外国投资者，一般都有自己的一套推销机构，熟悉国际市场情况，并在国际市场上享有一定的声誉，这样就为合营企业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九条就规定：“鼓励合营企业向国外销售产品。出口产品可由合营企业直接或与其有关的委托机构向国外市场出售”。再次，建立合营企业可以部分地节省我国的建设资金。《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四条规定：“在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中，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这样我们就可以腾出一部分建设资金来举办其他的企业或从事别的企业活动。合营企业给予外国投资者的便利（包括利息），一般也将由企业本身提供，不需要由国家支出。最后，建立合营企业，还有助于训练和培养技术人才和现代化企业的管理干部，从而提高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参加我国合营企业的国外企业，都是一些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并在本行业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公司或厂商，它们为了自身的发展，一般都设有为本企业培养技术力量的培训中心或场所，有的企业甚至设有专门的科研机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我方的人员，可以通过在合营协议或合同中作出相应规定的方式，进入这种培训中心去接受技术教育和训练，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六条还规定，合营企业的董事会有权任命或聘请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审计师等管理人员，包括选用外国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担任领导职务。这些就是合营企业的优点。

但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象上面已经指出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济组织，其中有不同的经济成份，因此，我们在吸收外国投资举办一些合营企业时，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首先，建立合营企业时必须明确设立合营企业的总的方针和具体的目标。我们搞合营企业，是要在无损于国家主权和经济独立的前提下，有选择地与外资搞些经济合作，以争取时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所以，我们举办合营企业是有选择的，不是盲目的，对合营企业的经营范围是有适当限制的。至于一个合营企业的具体目标，也必须有关的协议或合同中加入明确确定。明确规定一个合营企业的方针目标，有助于检查这个合营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和是否达到设立该企业时所预期的目标。这是运用经济规律来办企业所要求的。其次，建立合营企业必须贯彻以我为主的原则。合营企业是在我国境内建立的经济组织，是經我国政府的有关机关批准和登记后开始营业的。因此，“合营企业的一切活动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令和有关条例规定”（第二条第

二款）。合营企业的供产销活动，也应在国家计划和有关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下进行。我们是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主要经济活动都应纳入计划的轨道。只是由于合营企业的特殊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才变通地规定：“合营企业生产经营计划，应报主管部门备案，并通过经济合同方式执行。”

（第九条第一款）在我国合营企业中，董事长一职，由我方人员担任，合营企业的经理或厂长，一般也应由我方人员担任。有些企业为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也可选用外国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担任领导职务。建立合营企业还必须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举办合营企业是涉及中外双方的事，那末就必须做到双方都有利而不能只图某一方有利。对此，《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也作了一系列合理的规定，有的地方还从鼓励外国人在华投资出发，给外国投资者以适当的优待。例如，在评定合营各方作为资本入股的实物、专利权的价值时，规定由合营各方评议商定。董事会在处理合营企业的重大问题和解决合营各方的纠纷时，也强调首先应根据平等互利原则，由合营各方协商解决。在利润的分配上，合营各方按注册资本的比例分享利润，“外国合营者在履行法律和协议、合同规定的义务后所得的净利润，在合营企业期满或者中止时所分得的资金以及其它资金，可按合营企业合同规定的货币，通过中国银行按外汇管理条例汇往国外。”（第十条第一款）外籍职工的工资收入和其他正当收入，在交纳个人所得税后，也可通过中国银行按有关规定汇往国外。具有最先进技术水平的合营企业，还可以在开始获利的头两年至三年内申请减免所得税。外国合营者将分得的净利润在中国境内再投资时，可申请退还已缴纳的该部分所得税。这些都是平等互利的具体表现。合营企业只有切实贯彻了平等互利的原则，才能办得好，具有较长的生命力。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在我国境内举办合营企业的主要法律依据，它的公布和施行，将受到中外经济界法律界人士、特别是外国企业家的重视和欢迎。但是，举办合营企业是一件复杂和涉及面很广的事情。《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制定和公布，只是为这一特殊形式的经济组织在我国的确立奠定了立法的基础，要把合营企业认真办起来并且办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就以立法而言，除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还必须制定出一系列与合营企业密切有关的方法或条例，如所得税法、外汇管理条例、公司法、工商业登记条例等。拿税法来说，如果我们不制定、公布所得税法和规定所得税率，那末外国投资者就不清楚合营企业在获得盈利后要纳多少税，这样也就可能影响到他们对投资的兴趣或积极性。所以，我们还需要加紧工作，使与之有关的法令、条例逐渐地完备起来，以促进合营企业的发展。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重要的司法原则，长期以来，由于一些人认为是替阶级敌人说话，是为反革命分子争平等的口号，被否定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逐渐被打碎，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了这一原则，这对于我国的司法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

我们一定要把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区别开来，不然，就不能正确地了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真正含义。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法律的制定（立法），只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法律的实施（司法），则要求对所有社会成员具有普遍地效力。社会主义法适用于一切地区、一切机关、一切单位和一切个人。对于任何人都是应当是平等的权利。至于犯罪，阶级敌人破坏与人民内部犯罪，判罪量罪的宽、严、轻、重，都必须而且只能以法律来衡量。我们常说“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这个意思。

有人提出：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岂不是要让阶级敌人和人民群众享有平等的权利吗？这种认识是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平等的权利”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制定法律的时候，要规定各种人的权利。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法律，明确规定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表面上讲“平等的权利”，实质上资本家和工人的权利是不平等的。在我们国家的法律里，也不是规定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的。对于反革命分子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对于至今没有改造好的剥削阶级分子，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这样的法律既经制定以后，当其实施时，就必须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法律应当毫无例外地适用于一切人。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必须守法，任何人都不得违法，任何人都犯了罪都必须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制裁。即使是真正的反革命案件，也只能依法惩治。既然法律已经体现了阶级的不平等，就不应当在司法中再加上另外一层超法律的不平等。因此，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处理反革命案件和人民内部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决不是为阶级敌人争平等，恰恰相反，它正是维护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法律还规定了各种不同的权利，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有申诉权和辩护权，对判刑不

怎样理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服的所有上诉权等等。这些权利，适用于一切诉讼案件的当事人，甚至犯了死罪的人都可以行使这些权利。规定这些权利是为了使诉讼和审判工作正常进行，避免造成冤、假、错案。对于这样的法律诉讼权利，就应该是人人平等的。

彭真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强调指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们全体人民、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口号，是反对任何人搞特权的思想武器。”我们应该拿起这个武器，坚决地同一切特权思想作斗争。

特权思想是几千年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封建统治者思想的反映。它至今还在影响着一些人。有些人，当了“官”，拿了权，往往以为法律不过是共产党百姓的，自己则可以不受约束，似乎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法律之外。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使封建特权思想和各种歪风邪气恶性膨胀起来。他们根本否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肆意横行，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粉碎了“四人帮”，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正在逐渐恢复，但是，某些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法制，应当适用于一切人。不管任何人，不论他职位多高，资历多深，功劳多大，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无论什么人，违法犯罪，触犯了刑律，都不能加以纵容和包庇，都应该依法制裁。这样做，就会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原则，败坏党的声誉，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要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我们处理任何案件，定罪、量刑都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不应当也不允许另立其他的标准。应当特别强调：轻罪判罪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也同样是不正确的。有的人认为：对反革命专政，怎么搞也可以，对犯罪分子，处罚重一些也没有关系。还有的同志认为：法律是对付敌人和坏人的，不应当束缚我们的手脚。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认识往往使一些人在实际办案的时候，不依据法律，处罚判刑畸轻畸重，甚至随意司法徇私，出入人罪。这种搞法，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极易造成冤、假、错案。即使对于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人，也应当严格依法定罪、判刑。判刑应当十分严肃、慎重，按照刑法的明确规定，给予应得的惩处。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随意加重处罚，更不允许采用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逼供信。只有这样，才能使犯罪分子感到罪有应得，真正认罪服法，使法制起到应有的惩处和教育作用。

可以防止扩大化，避免伤害好人。

我们说，在认定反革命罪时，一定要注意规格，要看实施犯罪的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反革命目的，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反革命分子在进行犯罪活动以前，必然有一个如何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具体计划或者方案，而是要求我们根据案件的事实，来查明犯罪人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查明犯罪人行为的矛头确实是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就应当按反革命定罪判刑。例如，勾结外国，危害祖国，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等，尽管刑法条文上没有写明以反革命为目的，但其行为本身在客观上已经清楚地表明，它的目标是指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其反革命目的已经昭然若揭。对于实施这种犯罪行为的人，必须以反革命罪从重惩处。但是，象杀人、放火、破坏等犯罪行为，可能是反革命罪，也可能是普通刑事犯罪，弄得不好，很容易混淆二者的界限。为了严格区分反革命罪和普通刑事犯罪的界限，刑法第一百条和一百零一条都明文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这就是说，只有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杀人、放火、破坏，才能按反革命定罪。如果没有反革命目的，就被按普通刑事犯罪处理。是不是出于反革命的自的，需要根据被告人的行为动机、手段、侵犯的客体 and 危害后果，以及作案的时间、地点、环境、被告人的思想、一贯表现等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才能正确认定。

我国正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这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国内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敌对分子，必然要跳出来进行破坏和捣乱。但他们慑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必然非常隐蔽，手段也会非常毒辣。他们在往生命活动无法给予公民的民主权利，聚众闹事，妨害社会秩序；或者利用人民内部的一些违法乱纪行为，兴风作浪，扩大事态，鱼目混珠，以达到反革命目的。这就使两类矛盾容易混在一起，不好分辨。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更需要我们注意反革命的规格。对于证据确属的真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制裁。不这样，就不能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就不能保证四化建设。

“反革命罪”要货真价实

李 淳 崔庆森

是否反动来定罪。我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人们可以而且应当认真地思考问题，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等问题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允许对一些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和对现行政策有某种保留，以利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工作的同志“兼听”各种意见，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错误，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这是宪法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公民参与管理国家的表现。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更不允许把一些不同意见，随意定为反动思想甚至扣上反革命的罪名。即使政治思想确实反动，但只要没有反革命犯罪活动，就不能以反革命治罪。在我们的国家里，不允许判处“思想犯”。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夺政权的需要，疯狂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野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把“反革命罪”当成他们镇压群众的鞭子。他们别有用心地把党的领袖神化，把领袖的思想和宗教、教条化。谁若是损坏了一张领袖画像，喊错了一句口号，写错了语录中的一个字，或者对领袖思想中某一点提出不同的看法；谁若是对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造成的混乱局面表示不满，或因不了解情况，在议论林彪、“四人帮”时，对党或领袖发表过某些意见等等，统统被他们以“反革命恶毒攻击罪”逮捕判刑。如果有人敢于直接议论、反对他们的这些“高举”、“捍卫”的“中央首长”，那就要以现行反革命严重论处。党的好干部张志新同志，按照组织原则，反映文化大革命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这本来是一个党员的权利，根本不是犯罪，但是“四人帮”的死党却把她判处了死刑。“四人帮”就是这样滥用反革命罪诬陷广大干部和群众，使许多无辜者身陷囹圄，横遭迫害。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制造混乱，把一些不是以反革命为目的的犯

罪当成反革命罪处理，什么“反革命强奸罪”，“反革命贪污罪”，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弄得罪名混乱不堪，严重地混淆了罪与非罪、反革命罪与普通刑事犯罪的界限，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判处的反革命案件中，冤、错的比例一般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有些地区竟高达百分之六十或七十。

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司法干部中有少数人存在着“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不依法办事，不注意规格，似乎宁予越高越革命，判刑得越重越革命，结果把敌我矛盾扩大化，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当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当作反革命，严重地混淆了敌我界限，放纵了敌人，伤害了好人，给许多干部和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这样做，不仅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它深刻地告诉我们，对反革命作斗争，决不能凭某个大人物说谁是反革命，就得按反革命治罪，谁说是特务，就按特务治罪；我们 must 必须纠正不对，忠实于法律，忠实于事实真相，忠实于人民利益，严格依法办事。

为了充分吸取教训，“四人帮”给我们的反面教训，为了严格区分敌我、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我国刑法不仅对反革命罪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而且对于特别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反革命煽动罪作了明确规定：“以反革命标语、传单或者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才构成本罪。这个规定就可以把以反革命为目的的煽动罪，同人民群众中不是出于反革命目的，而是由于疏忽大意喊错口号、写错标语或在乱写乱画中形成的反动词句，以及少年儿童由于年幼无知而书写、散发、张贴有损于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词句加以区别，这样

莱蒙湖畔的声音

历时两天，有六十多个国家参加

的讨论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已经在日内瓦闭幕。尽管越苏两案在会前密切配合，一个伪装清白无辜，一个蓄意颠倒黑白，力图使会议变成只是替越南当局制造和驱赶难民的罪行承担后果的场所，但是出席会议的大多数国家，排除干扰，异口同声地从不同角度谴责了越南当局灭绝人性、驱赶难民的血腥政策，并纷纷表示难民问题不仅是收容、中转、安置的问题，而且应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就表明，难民问题的真相和实质是谁也掩盖不了的。这并不是哪个国家要挑起什么政治纷争，而是严酷的史实告诉人们，如果不触及难民问题的根源，也就是越南当局的内外政策，就不能有效地制止难民的外流。引人注意的是，越南代表一反往常的种种无赖腔调，在会上大讲其什么“善意、合作和建设性态度”，而且破例地没有指名攻击中国，也没有重弹诬蔑中国是难民问题“罪魁祸首”的滥调。河内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装出疲乏姿态，决不表明它要放下驱赶难

民的鞭子，立地成佛，而是由于它慑于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以低姿态来蒙混一方，以便继续干它驱赶难民的肮脏买卖。滥发在发言中大讲难民外流是什么“不足为怪的”，说什么过去和现在，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出现“具有相当规模的移民现象”，甚至厚着脸皮要美国、日本和中国分别在关岛、冲绳岛和海南岛为它“建立新的难民接待中心”。这些话表明，越南当局所谓“在一段适当的时期内，它将尽一切努力来制止（难民）非法离境的现象”，纯属应付世界舆论的花招。

苏联代表在会上不顾众所周知的事实，说什么“来自北方的”“挑衅”造成了难民外流，影射攻击中国。可见，莫斯科竟匆忙忙派人派主义到日内瓦，绝对不是出自什么人道主义的动机，而是为了给设在世界反共战线上和憎恨的浪潮中的盟友伸出“兄弟情谊”之手。这个满口人道主义的苏联代表，没有对投放在九万越南难民作出任何实在的表示，却大肆吹嘘苏联为了推行它的亚洲战略而向越南提供

的所谓“援助”。人们不能不问，越南当局侵略柬埔寨，控制老挝，武装侵犯中国边境，制造和驱赶难民，不正是在伙同你们的“援助”和支持吗？你们大谈你们给了越南多少粮食、消费品，为什么不谈你们给了多少火武器呢？苏联代表这种贼头鼠尾的表演，更加暴露了苏联是越南驱赶难民的同谋者。

依日内瓦市的莱蒙湖一面镜子，反映出了全世界对越南驱赶难民政策的极度憎恶。但是，这样一次国际会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印度支那的难民问题。正如中国代表团团长章文晋开门见山地指出的：“除非越南当局把军队撤回自己的领土，对本国人民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否则，越南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将证明，任何回避根本问题的办法，不可能制止印度支那难民的流出，因而也不能解决东南亚各国和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这一严重的挑战。



朝鲜中央通讯社受权发表声明 美国停止从南朝鲜撤军违背时代潮流

新华社平壤七月二十三日电 朝鲜中央通讯社七月二十三日就美国总统卡特宣布一九八一年以前冻结从南朝鲜撤走美军事力量发表声明指出，这是“违背全体朝鲜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愿望、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公然挑战行为”。

声明说：“卡特为使他自己抛弃‘撤军’计划的行为合法化，宣称我们增强了武装力量。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虚伪捏造。”

声明揭露美国在朝鲜增强武装力量把大量新的军事装备和作战物资运进南朝鲜的事实后说：“美国帝国主义者是企图

控制南朝鲜作为它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为实现这一侵略目的而企图永远保持对南朝鲜的军事霸占。”

声明说：“卡特这次取消‘撤军’诺言，是造成进一步加剧在朝鲜的军事对峙状态和紧张程度的新的契机，阻碍朝鲜和平与和平统一、严重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罪恶行为。”

“朝鲜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对这一危险事态的发展决不会置若罔闻。”

声明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必须抛弃企图分裂朝鲜、控制南朝鲜作为殖民地和军事基地的野心，必须带着所有美军事

和杀人武器毫不拖延地从南朝鲜撤出去。”

声明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政府很早以前就多次提出过保障朝鲜的持久和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光明正大的方案。”

“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首先举行在美国从南朝鲜撤走的条件下把停战协定换成和平协定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会谈，是必要的。”

声明说：“朝鲜人民决不允许美国帝国主义以‘实力’威胁我们，把我们的民族分为两半、永远霸占和支配南朝鲜和犯下罪恶的阴谋活动，在世界爱好和平

南斯拉夫和孟加拉国声援朝鲜人民统一祖国斗争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七月二十一日电 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席会议主席团委员、外交和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巴科切维奇七月二十日发表讲话，声援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

他说，南斯拉夫人民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下和平统一朝鲜的立场，完全支持南北朝鲜对话，并谴责把朝鲜分为两部分的所有企图。他强调指出，必须从南朝鲜撤出外国军队，并拆除外国军事基地，这是朝鲜统一的重要前提。

新华社达卡七月二十三日电 孟加拉国五百多群众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在达卡举行集会

支持朝鲜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

这次集会是由新成立的孟加拉国支持朝鲜统一国际委员会组织的。

孟加拉国人民党主席卡齐·扎法尔·艾哈默德、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主席穆哈默德·吐哈和孟加拉国人民党（巴沙尼派）总书记安瓦尔·希希德在会上讲了话，表示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为统一祖国而进行的斗争。他们还严厉批评美国长期坚持在南朝鲜驻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军事威胁。他们指出，朝鲜人民的斗争是世界反帝斗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他们要求美国军队立即撤出南朝鲜，要求朝鲜实现统一。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埃及临时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革命二十周年纪念。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阿根廷共和国新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保利诺·丹尼尔·阿曼多·穆萨基约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黄华外长曾会见了穆萨基约大使。

图说：为递交国书时情形。

做贼心虚处境尴尬

新华社记者 苏元椿

七月二十日上午十时许，日内瓦万国宫三层的会议大厅里熙熙攘攘，来自六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已相继入座，由联合国秘书长召开的讨论印度支那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就要开始。可是，越南的席位却仍然空着。直到会议主席、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走上主席台快要宣布开会的时候，越南代表团团长潘廷芳才姗姗来迟地步入会场就座，时间紧迫得使记者差一点来不及给他拍照就得退场。

在整个会议期间，越南代表团理屈词穷，这反映了它在难民问题上的被告地位。它曾费尽心机，妄图逃脱国际上对它的审判，可是却节节败退，最终不得不坐上了被告席。

首先，越南当局未能阻挠这次会议的召开。它心里明白：只要这个会议公开，这件事本身就是对越南的一种国际政治压力。为此，越南外交部曾在六月二十一日发表声明说，越南只参加由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召开的会议，指责其他会议是“为了实现反对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阴谋”。越南副外长裴碧山在同一天也发表声明呼吁召开的讨论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实质上是为其掩盖他们反对越南的卑鄙阴谋和意图”。越南驻印尼等国使馆甚至发表声明，表示越南拒绝参加任何讨论难民问题的国际会议。然而，迫于世界舆论的巨大压力，越南代表团终于不得不在临时决定参加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保驾下来到日内瓦。

其次，越南当局未能阻止会议上的发言者涉及政治问题。潘廷一到日内瓦，马上就对记者发表谈话，他反对在会上进行政治辩论，说什么主要是讨论难民问题的政治方面，谁就是破坏会议。越南当权者在印度支那横行霸道惯了，到日内瓦还用这种蛮不讲理的口气说话。然而，他们这一套在国际会议上是不行不通的。不少国家代表在发言中除了谈救济和安置难民问题外，还点出了难民问题的根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南代表团竭力反对在会上进行政治辩论，苏联代表却在发言中竭力进行政治辩论，不指名地指责了在他之前发言的许多代表，甚至还指责会议的组织者没有邀请越南在柬埔寨的傀儡和古巴等国与会，这就戳穿了越南代表团的所谓

他的手眼。

十四日上午，我宁明县桐棉公社板村社员在田里劳动，越南武装人员向他们打靶。这个村的两条耕牛受害，向边区跑去。八个越南武装人员企图用枪机枪耕牛，并越境向广西追迫的社员开枪。我民兵予以

越南武装人员继续在我广西边境地区挑衅

新华社南宁七月二十三日电 七月中旬以来，越南武装人员又不断向我广西边境地区开枪、开炮，严重威胁我边境生命财产的安全，使生产不能正常进行。

从十一日到二十日，仅在我防城各族自治县边境地区，越南武装人员就向我挑衅六次之多，并有三天连续向这个县的峒中公社开枪射击。其中，十八日夜间，越南八人侵入我峒中公社境内近两公里，并疯狂向我民兵射击。在我民兵还击后，越南侵略军才仓皇逃去。二十日中午，东兴公社那屋生产队社员从武刚寨完田准备回家，被藏在暗堡里的越南武装人员用重机枪射击，打伤了

柬革命军控制五号公路一些路段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据民主柬埔寨电台广播，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紧密配合，七月初以来在五号公路沿线袭击越南侵略军，控制了从乌梯到乌梯望的五号公路的一些路段，解放了这条公路沿线的许多村庄。与此同时，革命军和游击队还在多处切断了四号公路。

七月九日，革命军和游击队袭击了从十号公路路口到达北的六十四号公路沿线的越南侵略军，完全解放了六十四号公路及公路沿线的村庄。

我代表团团长离日内瓦回国

新华社日内瓦七月二十二日电 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在出席七月二十日到二十一日于日内瓦举行的印支难民问题国际会议后，今天晚上乘飞机离开日内瓦回国。

在过去三天里，章文晋先后拜会了美国副总统沃特·蒙代尔以及泰国、马来西亚、菲

美国“旅行者-2号”拍摄木星及其卫星

本报讯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旅行者-2号”七月八日在距离木星的冰雪覆盖的卫星卡利斯托不到三万二千零七十里处飞过。它传回回来的新图像显示，有大红斑的木星的云层更明亮了，这表明木星的大气物质，例如高空云可能在增加。

新的图像同“旅行者-1号”三月间传送的木星照片形成对照，三月间的照片显示了环绕更复杂的微红色和几种浅蓝色相混的色彩。在红斑上发现白色区域增大，是同“先驱者-10号”一九七四年拍到的图像所相似。

“旅行者-2号”（离地球约五亿七千万英里，以每小时三万英里速度航行）拍摄的照片还表明，木星周围的环大概是十分狭窄的，它更象天王星周围的环，而不象土星周围的环。

科学家们说，根据“旅行者-1号”的资料估计，木星的环至少有八英里那么细，也许更细一些。

还可以看见卡利斯托的近距照片显示它的表面有许多暗红色的坑——最小的坑有八英里到十英里长。

在卡利斯托的表面结构中，发现的区域性差异显示出橙黄色区域和浅蓝色区域，这使科

“反对政治辩论”，就是只能让他们在会上诽谤别人，而不准别人说事实真相。

第三，越南当局终究未能卸自己在难民问题上的责任。按照潘廷芳在会上的说法，越南当局在造成难民大量外流上毫无责任。而且，处理安置难民也只是别国的责任，与越南无关。他要求其它国家设立更多的临时收容难民的受理中心，并保证为建立更多的处理中心提供资金；他还要求发达国家给予更多的财政和粮食援助，以及接纳更多的难民。他要求“其它国家和国际组织为解决难民问题作出积极的贡献”。这是什么态度！一场国际灾难和人道惨剧的制造者居然推卸地要别的国家干这干那来消除这场灾难的后果，自己却什么具体义务也不承担。一位外国记者听了潘廷芳的发言后苦笑着说：“这位副外长的讲话似乎是宣称越南是世界上最人道主义的国家！”越南当局想在难民问题上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但是，许多代表在会上正严正地指出，越南政府对难民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必须改变它的政策，其中包括对邻国的政策。

这次会议，对上述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分清是非，伸张了正义。当然，仅仅两天的会议不可能解决多少问题，特别是根本问题。越南当局制造和输出了上百万难民，使他们受尽磨难，也使许多国家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面临严重的困难。这些情况迫切要求这次会议主要处理一些紧迫的救济和安置问题也是必要的。但是，不少代表表示，印度支那难民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还需要在适当场合进一步讨论这场国际灾难的政治根源，并从根子上加以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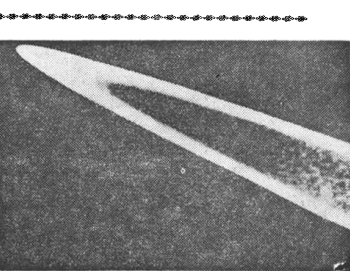
输血 禹石柱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三日电 苏联塔斯社七月二十日发表声明，攻击欧洲议会支持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停止向越南提供粮食援助的决议，说作出这个决议的行动是“具有极为不光彩性质的政治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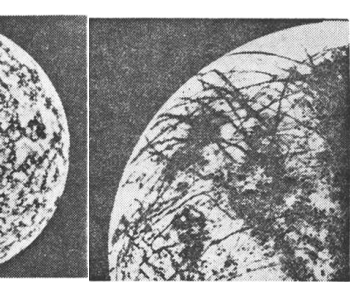
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七月初作出决定，停止对越南的粮食援助，以此作为促使继续输出难民的越南当局改弦易辙的一种措施，同时把计划援助越南的款项转用于紧急救助越南难民。在越南当局拒不承认越南难民，煽动别国，并借机扩大难民问题的时候，欧洲共同体作出这个决定，是非常合理的。但它却遭到塔斯社的无理攻击。这家通讯社七月五日发表的一篇评论破口大骂，说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的决定是“可耻的”，“在本质上是卑鄙的”。还说什么“共同市场”国家“想加入围绕所谓难民问题掀起的居心险恶的反越排越运动”等等。但是，事隔不久，欧洲议会又在十九日和二十日开会，会上通过决议，决定支持欧洲共同体的上述决议，于是这个正义行动又遭到塔斯社的诽谤。

最近一个时期，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挪威、美国、西德等国宣布停止援助越南的时候，塔斯社和苏联报刊莫不出面攻击。塔斯社说澳大利亚作出的停止援助越南的决议是“地地道道的厚颜无耻的行动”。

莫斯科气急败坏的咒骂阻止不了别人对越南的制裁，相反却恰恰说明，苏联是越南难民输出政策的帮凶。英国《经济学家》指出：“没有苏联的支持，越南也不会如此肆无忌惮。”《远东经济评论》最近发表文章指出：“有各种证据显示，越南将大批以华裔为主的居民驱逐出国成为难民，是越南在苏联支持下，要在这个地区建立霸权的庞大计划的一部分。”



“旅行者-2号”七月十日在九十三万英里处拍摄木星环的照片。在这个明亮的环内圈可看到一个暗的环，它可能同木星的大气层相接。



这是木星的卫星“欧罗巴”的照片。它是美国“旅行者-2号”七月九日于十五万两千英里处拍摄的，可辨别出约二点五英里的地貌。照片上纵横交叉的长条形是长达几千英里的沟或大裂缝，但看不到明显的火山口。

